

在上海交大 2011-11-5 “中日美关系论坛” 的发言

中国社科院 日本所研究员李薇

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日美三国关系的影响

引子

两个月前的 9 月 6 日，日本研究所和东京财团曾在北京召开“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研讨会，在我们准备那个会议的同时，上海方面也在准备今天的这个会议，我们几乎在同一时间相互发出了邀请。两个会议，有共同的志向，即在亚太地区新格局形成的现在，中日美三边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三国如果能够寻求合作，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会议希望通过交流，尽可能地走向并接近共识。

我在上次的会议上被要求简述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对日本是否存在外交战略存在疑问。从战后日本外交看，基本的线条是跟随美国的战略发展展开，虽然受到宪法的制约，但 90 年代以来制定的一些特殊法，更加能够说明日本对美国的跟随。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等日本有影响的政治家相继提出了有关日本国家战略的口号，无论是期待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大国”的口号，还是与冷战结束相关联的“普通国家”的口号，都反映出日本提升国际地位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诉求。90 年代以来，日本利用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实际扩大了日本外交以及军事的影响。这种半独立的外交军事状态，很难定义日本是否有自己明晰的战略，因此，我认为日本“至少有政治

大国的战略目标”，而仅有目标，还并不能令人清晰地认识它为实现目标所制定的战略及其步骤。

在上次的会议上，我对中日美三边关系、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问题提出了我的基本看法：（1）处理中日关系时应注意不要有意无意地把中日两国的关系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2）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严重地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历史和解。由于历史反思不仅是国家的道歉，更是触及个体灵魂的思考，因而艰难并具有长期性；（3）钓鱼岛存在争议可以以 1972 年恢复邦交时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见谈话为证明，而 90 年代以来日本外务省转变为否认争议的做法，意味着否定了双方“搁置争议”的默契。

以下围绕此次会议的主题谈三点看法。

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目的

2009 年奥巴马首次出访就强调了“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比太平洋地区的变化更剧烈，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命运也在这一变化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洲的未来与美国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国防部长帕内塔 10 月 24 日在美军驻日司令部横田空军基地表示，将继续并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驻军。

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的外交行动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2010 年 7 月 23 日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表示，南海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利益，为解决南海问题美国有意主持召开国际会

议¹。这表明，美国在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同年十月，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讲话，特别强调了美国在亚洲的与盟友日本等国的关系，以及介入地区性组织的意欲。

希拉里在 2011 年 10 月 11 日出版的《外交政策》双月刊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阐述了美国未来十年亚太战略。该文强调：今后十年美国外交方略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与中国等区域大国的工作关系、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广泛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希拉里称，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对华的方针是立足现实，注重成效，忠诚于自身原则和利益。²

以上这些讲话不仅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表述得十分清晰，也把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美国利益表白得非常清楚。

二、美国战略对中日两国的不同目标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快速崛起。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特别是 2008 年以来中国在克服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与日俱增。“美国的担心是，中国在经济强大后，还希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这是美国决不能允许的”。³这种“不允许”一方面是出于外交传统的原因——有三种传统思想对美国的

¹ 路透社 2010 年 7 月 23 日河内电。

² 该文的中文版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由《参考资料》转载。

³ 王缉思，《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三期 P21，“未来十年的中国与美国”座谈发言。

外交政策起主要作用：“就是大国意识、种族的等级观念和害怕革命”；⁴另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打击巨大，很多人甚至对美国的实力以及美国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怀疑，严重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国内政治——下届总统选举。美国战略调整的中国指向非常明确。

日本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后的战略重要性更加凸显。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冷战的结束以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挫折，甚至到 2008- 2009 年美国在艰难应对金融危机时期，有很多人注意到“美国几乎不再看日本一眼”。自从 2008 年底日本自民党政权出现难以为继危机，特别是 2009 年日本民主党上台，鸠山政权希望调整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日本国内出现新的“安保论争”的时候，美国的外交精英展开了一系列密集的对日工作。2010 年鸠山的下台，标志着日本民主党政权哪怕是与美国拉开一点点距离的尝试都是绝对不能被美国容忍的，特别是在战略重心东移的关键时刻。美国的战略家坦言，没有日本这个战略同盟的存在，美国的亚太战略几乎不可能实现。

三、美国战略促使日本民主党对美对华外交同步调整

日本在 2010 年菅直人内阁成立后，在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上，与鸠山内阁时期相比出现了大回转现象，明确定位于对美战略大合作。我们看到，菅直人内阁急于修复对美关系，在外交与安全事务上不断重复对美国的承诺，把周边外交的出发点定位于日美同盟，在不断参与美国主导的军演的同时，与美国共同进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美国方面也注意给足日本面子，强调“最重要的同盟关系”，并走向更紧密的战略合作。野田政权成

⁴ 资中筠在论文《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中引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Michael Hunt《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观点。载张蕴岭主编《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与实践》P169，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立伊始，再次重申了对美紧密战略合作的外交定位。2011年10月野田在视察自卫队时的讲话明确显示出与美国对华论调的一致性。

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对华外交和军事部署与美国战略东移同步。2010年以来日本的对华关系与对美关系呈现同步的快速调整。菅直人政权执政以来，在日美同盟关系被重新定位于外交安全的“基轴”，战略信任加深，双边关系逐渐转暖的同时，日本将中国定位于“潜在威胁”，战略信任荡然无存，双边关系迅速转冷。从近一年来的日美双方著名战略家们就东亚战略安全所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凡是主张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文章，大多是以防范中国、朝鲜为其论据的。⁵这种变化，既反映出冷战结束后新现实主义对华安全政策的主导性思路的延续，也反映了民主党政权在对华安全战略上从鸠山的新自由主义向菅直人政权、野田政权的新现实主义的回归。

2010年12月17日日本公布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和2011-2015年《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以及2011年版的新《防卫白皮书》均足以证明上述同步调整。日本战略调整显示出日本对中国军事能力的过于夸大，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日益加深。日本多次督促美国做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表态，在领土问题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硬。⁶虽然日本的军费没有增加，但是战略调整的动向明显，对华防务质量和军事部署升级，围堵势头增大，中日海上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加。

⁵ 2008年至2010年之间约瑟夫·奈的文章和讲话最具代表性。2011年1月3日（日）《读卖新闻》刊登了该报邀请约瑟夫·奈和外交事务次官薮中三十二进行的网络对谈，摘录如下。薮中：“……日本人需要促成意识和态度发生大变革的刺激”，奈：“中国自我主张的加强及北朝鲜的威胁不就是刺激吗？”，“……2009年秋民主党上台之初，曾经担心日本疏远美国，转而靠近中国，现在这种担忧似乎完全没有必要了”。

⁶ 日本担心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偏向中国，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劳利被问到美国之前关于钓鱼岛的立场时，在被追问的情况下表示：“如果你今天问我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答案会是肯定的”。2010年9月钓鱼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再次要求希拉里表态，2011年1月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访问美国时，再次求得美国

此外，与过去强调在美军保护下“专守防卫”相比，新防卫大纲显示的趋势值得注意，即日本未来将进一步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出动自卫队与美军并肩作战。这个调整符合日美双方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的地缘位置、制造能力、配套服务、军事基地成本的分担等都非常重要，而对于日本来说，借助美国高调、快速的重返亚洲战略，将实现更加积极的外向的军事发展。

随着美国加大向东亚地区驻军的力度，日本战略调整也扩大到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2010年底，日韩双方分别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对方国家与美国举行的大型军事演习；双方还就《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该协定一旦签署，意味着军事合作的升级。2011年，日本与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相继加强了军事方面的合作，有意在南海问题上形成对中国的联合对抗态势。这是日本为提高自身在东亚新格局中的“砝码”所采取的行动，而日本加快军事实力建设的趋势以及与周边国家联合抗衡中国的做法将给东亚格局带来负面作用。

总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牵制中国的同时，不愿对中国形成对立，因而注意保持既合作又遏制的态势，美国领导人的讲话无不关注到遏制中国以保持其自身的领导地位和控制力。日本对中国更多显示利用美国遏制中国以及利用中国与周边矛盾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态势。相对于中美之间，中日之间的领土争议更为敏感，更需要尽快搁置争议并建立共同危机管理机制。

四、结语

正确认知中国是处理好中日美三国关系的关键。巨变之时是出现误判和意外冲突风险最多的时期，现在的东亚地区正处于这样的风险之中。环境变化容易导致心态的变化，而心态变化是导致外交决策心理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中日美三国需要坦率地交流，以防止误判和冲突的发生。

中国没有威胁他国的主观意愿。美国领导人总是强调要管理这个世界，在这个管理中，美国必须是领导者，引用希拉里的话说，就是“确保在未来的世纪中美国一如既往地发挥领导作用”，“我们是美国，需要关心让我们处于最强有力地位的事情”⁷。而中国恰恰不想争霸，主张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前提是美国不得在任何事情上强加于中国。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自那时起中国之民族诉求非常明确，就是国家独立、富强，在国际上“以求平等待我之民族”。从那之后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与改革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诉求。这个诉求体现在1978年以来体现在国家目标上，即改革开放。人心思定，民众与党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制国家，顺应了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潮流与现实。中国融入了国际社会，加入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我认为，中国的目标与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无根本性矛盾。我希望美国和日本应当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多一些包容与善意的帮助。

中国也没有威胁他国的客观条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这一目标的道路是完成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日美两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体系的建立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在经济、军事、软实力上距

⁷ 10月14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

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距离日本能够保持 GDP 世界第二达 42 年之久，还要经受 41 年的考验。中国在海洋发展实力、现有舰艇的高科技含量以及航母制造能力方面与美国相比还差得很远，也比不上日本。如果用 GDP 总量、排放量、增长率、顺差和外汇储备、高楼与汽车来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显然会导致片面的认识和误解。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需要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制度水平、市场水平、技术水平、环境水平等多角度进行综合评价。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差距还很大。主要表现在：（1）人均 GDP 很低，根据 IMF 的统计，201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为 4382 美元，位居全球第 95 位。日本则为第 16 位，人均 42820 美元，是中国的 10 倍。（2）反映出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水平的人文发展指数还很低，据 UNDP2009 年 10 月发布的年度人类发展指数显示，中国为 0.772，仅排在世界第 92 位。（3）社会制度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处距很大，例如各类保险的覆盖面、公民治理等水平较低，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超过 0.45，短期内难以缩小。（4）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贫困人口总量仍旧很大。（5）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技术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中国需要比其他国家花更多的时间应对外界的误判。由于中国的整体形成是个历史的产物，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独立体，因此，外国人理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因为不了解或者不理解而故意提出伪命题，或者产生误判。

今后很长时期内，中美关系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也将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能否正确处理中美日三国关系关系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

与稳定。目前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以及紧随其后的日本外交安全动向都显示出对中国的误判和制衡。有些来自日本的声音值得注意，如有人强调将中日关系放在美日同盟的平台上处理，还有人强调要参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周边外交的介入等。我仍旧认为，中美日三国关系需要摆正。中美关系根本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日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出现误判，将会严重影响双边或三边的关系。